告别富春

许家树

百年老店上海富春小笼愚园路总店因动迁,12月31日关张,今后不会再回到此地。那天晚上我和内人在关张前再来用一次餐,也算告别。

由于住在同一条马路上,步行过去也就十来分钟,所以我经常在此用餐。富春位于愚园路中段,西面接近镇宁路,整条愚园路从常德路到中山公园都是洋房西式弄堂,就这一小段是本地房子。住在这一小片地段的居民一直盼拆迁,可是富春是七证齐全的正规老字号,具有一票否决权,只要富春不愿搬,所有人只能白板对煞。好在富春为了让老邻居们过上舒心日子,顾全大局,另觅地方去了。

愚园路富春名声在外。记得有一年老同学回来,我请他去东艺听世界著名的圣彼得堡交响乐团音乐会,散场有点晚,当我送他回到大胜胡同家后,已没有公交车了,好在路不算太远,我就步行回家。走到静安寺,有两位年轻人上来问询,富春小笼怎么走。我说半夜了,你们胃口真好。他们笑着说,刚从台湾来,下飞机到宾馆放下行李后就专程来尝鲜,还说都知道富春是24小时营业。我就顺路把他们带到富春,看了一眼,只见店里灯火通明,食客还真不少。

富春坐北朝南占了三个门面。底楼堂吃点心,二三楼只有一开间门面,供应本帮菜与淮扬菜。周围高档餐馆比比皆是,但价格适中的本帮菜馆极少,我来此地大多是上楼点菜。走上老式木楼梯,狭长的前楼靠两边放了七只半长方桌,四人一桌坐满30人。后楼四张方桌,亭子间太小只好放一张六人小圆桌。吱吱嘎嘎走上假三层,斜屋顶下只能放一张圆台面。有次十位文友来我家谈诗说词,中午就在富春三楼觥筹交错,连珠妙语趁着酒气直溢出老虎窗。最近的一次是与好友作家修晓林等三人相约在此,二楼靠窗座上边吃边聊,足足三个多小时。

听说富春要关门,这两天来吃点心、用餐的人莫老老。早上10点左右我溜达经过,只见两边的店铺都已用砖头封掉了,唯有富春还暂时关不了,店堂里面挤得满满当当,站在桌边插蜡烛的也不少。我跑到路对面拍了一张照留念。晚上我与妻子五点出门,还是晚了一步,只见等餐的队伍从二楼排下来,转弯再到一楼。听说上面的人四点不到就来了,我们只好等候翻台子。手机看到眼花,腰背酸到断脱,终于轮到了,我们与两位大汉共拼一桌。上菜后桌子之小放不下,只能勉强盆上叠盆,借进错出。好几次我差点把筷子伸到隔壁人家盆子里去,心里别别跳。瞎吃八吃,当心吃生活!

还没吃完,见后面用餐的人已等不及了,便胡乱扒了几口饭,剩菜也不要了,拿起外套围巾帽子雨伞,赶紧下楼出门。冷风一吹,连忙穿衣戴帽,佝头缩颈,对着富春店堂匆匆说一声Goodbye,权当告别。回到家中,意犹未尽,写下感受,告别富春!

耳朵历险记

周建

冬天一到,就会想到曾经经历的严冬。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大兴安岭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插队落户。大兴安岭的冬季,天寒地冻,冰天雪地,零下四五十摄氏度。向远处眺望,皑皑白雪银光耀眼,山上持续不断地升腾起似雾非雾、似烟非烟白蒙蒙的一缕缕寒气。持续低温使得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凝华,当地人把这种天气形象地称为“冷到冒白烟了”。一桶水通过轱辘从井下摇上来,一不小心从桶里溅出的水花,滴到鞋子、裤腿上就是冰点。泼出门外一盆温热的洗脸水,撒到地面上,见到的就是滑溜溜的一地冰。

在这样的天气里,即使厚厚的棉袄、棉裤、棉帽、棉鞋、棉手套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在室外不一会儿,棉帽结上霜,胡子和鬓角都染上白霜,男人个个像小老头;女人露在外面的头发也染白了,就连睫毛上都结了冰晶,如同老太太;耳朵最经不起冻,必须用棉帽子捂得严严实实;鼻子冻得酸溜溜,若鼻尖发白,必定冻伤了;赤手抓铁器,两者将牢牢粘住,难解难分;双脚如同两块冰砣,手指被冻成了红通通的似胡罗卜,麻木不听唤,而且特容易冻伤起泡。

不要以为冷成这样就无需外出干活,事实恰恰相反,不仅要干,而且干得更欢。那时上山伐木是生产队冬季副业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冰冻三尺的低温下只有不停地干活,才能保存体内仅存的温度,否则很快被冻僵。

那是一个雪虐风饕的冬天,我们在深山老林中放树,两人一组,手持双人长锯,跪在雪地上干活。尽管低温,由于不停地进行着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不一会儿我身体开始冒汗,头上的棉帽子已戴不住了,一时兴起,随手将帽子扔往一边,心无旁骛努力干活。收工时戴上帽子,拉下帽耳,感觉从未有过的怪异,随手一摸耳朵,手感不同寻常:触碰到两片硬邦邦之物,毫无知觉。心中咯噔一下,嘟囔了一句“坏了”,不祥之感顷刻降临,吓得六神无主。此耳非我耳,已完全麻木,冻成了“木耳”。联想起老乡曾说起过当地有人冻掉耳朵之事,更是不知所措。

同伴急搬救兵,老乡随即而来,慢慢轻揉双耳,用雪反复擦拭,估摸半小时后,耳朵渐渐产生了知觉,血液流通逐步恢复正常。我跟随老乡进入室内,耳朵虽恢复知觉,但火辣辣的痛却不依不饶地缠绕着。我极力忍受着阵阵钻心的痛,忧心忡忡地问老乡耳朵能否保住,其回答不置可否,令我如坐针毡。冻掉耳朵的恐惧,无时无刻地摧残着我,使我精神崩溃,比皮肉痛苦有过之而无不及,彻夜未眠。

次日摸摸双耳,依然完好无损地长在脸颊两旁,顿时心情大好。只是双耳鼓起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水泡,胀鼓鼓地肿了起来,一对耳朵整整大了一圈。疼痛与我形影不离,日夜相伴左右,那些日子真是在煎熬中度日如年。许久,水泡慢慢瘪下,死皮渐渐结疥脱落,一个月后新皮才缓缓长成。

事后老乡告诉我:“在极寒冷的户外干活,耳朵没有任何防护,耳廓由于长时间缺血、缺氧发生干性坏死,耳朵真的会冻到缺损或一碰就掉。必须先用雪慢慢搓、轻轻揉,在摩擦中缓慢地产生热量,促使冻僵的耳朵血液循环趋向正常,才能慢慢缓过来。如果不解冻直接进入温暖室内,因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可能这双耳朵就报废了。”闻言大惊失色,又是后怕,连连道谢。

此后,脑海中也时常会出现冻耳朵这毛骨悚然的一幕,挥之不去,不寒而栗。好在过程痛苦,结果却是完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此乃不幸中大幸!岁月流逝,至今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可怕经历,仍心有余悸。

吴先生的“固辞”

潘志豪

老派人喜欢岁末盘点账目,我则习惯于年初整理旧文。日前,忽然翻出一张2005年5月1日的新民晚报,在“夜光杯”上有一篇吴承惠(秦绿枝)先生的文章,题为《父与子》。文中写道:“周少麟兄打电话来告诉我:5月1日上午10时半,东方电视台文艺频道将播放有关评述周信芳、周少麟父子艺术生涯纪录片,要我留心看一看,并说‘里面可能也有你的镜头’。怎么会有我呢?原来电视台那天到乡味园拍摄周少麟在票房活动的情况,正好我也撞了去,被该片的编导潘志豪先生捉住,要我也讲上两句,固辞不获。但仓促之间,我不知道我说得得体不得体。”这段文字使我想起和吴先生的一面之缘。

我自1983年迄今已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193篇文章(包括小品、随笔、评论、消息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吴先生主政副刊部时发表的,而且经常拜读吴先生那些辨识度极高的妙文,对他甚为心仪,却又无缘识荆,因此有事总想邀请先生出场。先生在文中说对我的采访“固辞”,这是不错的;但其实他对我的“固辞”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一次是在1993年,东方电视台推出谈话类节目《东方直播室》,因话题极接地气,故而收视率颇高。我是该节目的编导之一。当时,上海昆剧团的新戏《上灵山》引人注目,却又众说纷纭。于是我以此为由头,决定做一档节目,并邀请对戏曲极有研究的吴承惠先生担任主要嘉宾。我打电话向吴先生发出邀请,谁知他恰似武侠小说中的“绵里针”,软中有硬地婉言固辞。他的理由很简单:“我迪个人写写还马马虎虎,叫我讲讲就一塌糊涂。”对吴先生,我是应该执弟子之礼的,自然不敢造次,于是这次邀约只能作罢。

过了12年,到了2005年,我因为要拍关于周信芳、周少麟父子的专题片《海派父子》,又致电吴承惠先生表达采访他的愿望。吴先生依旧不改“固辞”的口风,不过这次的理由令人发噱:“人家侪讲‘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我迪个人只会动手(写),不会动口(说)……”万般无奈,我只得向周少麟先生讨救兵了。少麟先生笑眯眯地授我锦囊妙计:后天乡味园票房有活动,老票友吴先生一定会去,你就笃定可以“捉牢伊了”。少麟先生还向我面授机宜:无论吴先生有啥借口,依勿放伊过门。果然,那天不出少麟先生所料,吴先生终于被我“捉住”。吴先生见难以脱身,就向我力荐两位谙熟戏曲的行家里手,声称“伊拉保证比我水平高”。我则按少麟先生的既定方针,只管叫摄像师和灯光师对着吴先生动作起来。吴先生毕竟是长者仁心,他见“固辞不获”,就非常配合地接受采访,虽已迟暮之年,谈锋依然很健,使我的采访顺利完成。

事后,吴先生还是感到不安:“仓促之间(接受采访),我不知道我说得得体不得体。”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是“羌笛无调信口吹”,其实是别具慧眼最得体。比如,人所共知《萧何月下追韩信》是麒派名剧,吴先生却认为该剧越是风行于世,也越是容易在表演上流于浅俗,降低了萧何作为大汉丞相的格调。再如,有人对周少麟用余派的方法唱麒派颇有微言,吴先生则力排众议:“既然麒派的唱是谭派汪派的变调,少麟现在再一变,也是顺理成章的。”吴先生这篇文章见报后,我赶紧去电安抚他:“吴先生,依讲得不要太精彩嗷!”吴先生笑了:“侬大概是勒吹捧我。”接着话题一转,立马指出我这部片子中的某处字幕的不当,并调侃说:“侬吹捧我,我不吹捧侬,否则岂不是相互吹捧了吗?”吴先生为人率性耿直,自律甚严,于此可见一斑。

光阴荏苒。吴承惠先生去世已有两周年了。谨以此文,向先生的在天之灵,遥祭一瓣心香。

车棚曲径两依依

朱伟强

母亲去年12月6日早上在昏睡中突然离开了我,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她。听着天堂飘雪深情演唱的《想念妈妈》,任凭泪水肆意地流……

母亲一生勤劳。她从小力气就大,曾自豪地对我说读初中时扔手榴弹全班第一名。父亲56岁就因病离开了我们,当时她才48岁。她听外婆的话,没有再婚,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以前早上我骑着父亲留下的自行车上班时,母亲就在阳台上目送我远去;傍晚她就趴在阳台上等我下班回家。一看到我把自行车停进车棚,马上从6楼跑下来,用力擦车,擦得油光锃亮。我工作后曾带母亲到云南、无锡等地旅游,和妻子常买营养品和水果给她吃,节假日带她到饭店就餐……这些本分的小事,她都开心地一一在记事本上记下来。前几天又到以前住的长宁路房子周围走走,车棚还在,恍惚间又看到了母亲在那忙碌擦车的身影……

2017年9月母亲被确诊患癌症。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她记性不好,无法照顾自己,我特意为她雇了位住家保姆。我每天下班后就去看她,知道她一直在想着我等着我。保姆每星期天休息,我星期六下午先去超市采购一周所需的食用品,晚上再去接她到我家去住。从她家到我家10分钟左右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我们谈今忆往、其乐融融。星期天我为母亲准备一日三餐,照顾她吃药,为她洗长裤、剪脚指甲,督促她刷牙、洗脸、洗手、洗脚、做操……母亲说在儿子家自己也要做点事,便主动为我补衣服、扫地等。星期一早上我把母亲送到家托给保姆才放心地去上班。如今,每当晚上我一个人孤单地走在那曾留下我们母子无数双脚印的小路上,就不免睹物思人,潸然泪下。

母亲曾几次和我说想走了,不愿让我太辛苦。我说妈妈您不能走,儿子已没有爸爸了,不能再没有妈妈。母亲走前一段时间,全身无力、经常昏睡。我喂她吃东西时,常对她说,外婆活到93岁,您要向外婆看齐,所以要多吃。母亲点点头。可是母亲离开了,享年80岁。母亲走前一天的下午,我看到她紧闭的双眼流出了泪水。她一定知道自己要走了,舍不得儿子呀。

母亲,您活着,儿子辛苦;您走了,儿子心苦。父亲走得早,真希望您能多陪我几年,我就是再辛劳也心甘情愿!我现在想您了,就拿出我们母子曾经拍的几张合影看,您在儿子身边笑得多高兴啊!而看照片的我,泪水夺眶而出。

新民晚报 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摄影

七夕会

家育并蒂莲

冯联清

一缸清水,莲叶翻卷,并蒂莲开,给我家、给邻里不小的惊喜。

自幼熟读《爱莲说》。我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感佩她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简约;更敬重她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高雅。养莲之念早已有之,但囿于室小而成遐想。今得之宽大露台,购置大水缸,培育莲苗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乎,快递送来大缸、特制泥、莲苗、碎石等很快就将莲苗种下。随后,放满一池清水,投放了数十尾微小野鱼。经过两个月的静观与等待,终于迎来了并蒂莲双双绽放的喜庆日子。

一池清水中,两朵莲花犹如才睡醒的少女,浓妆而不妖,淡雅送芬芳。夏风起涟漪,莲叶舞蹁跹。这花中精品给人的愉悦享受,还真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有花最好有雨。天上之水纷纷然,花和叶中珠点点。几滴顽皮的水珠,借着风势,在莲叶上不安分地滚来滚去,让人凭空产生无限想象。

闲暇,一壶新茶,一本旧书,在“莲池”畔品茗阅读,清静而闲适。偶睨莲花,见其正叩首于天地,淡然于人之评语,品性让人顿生敬重之意。

莲花很有灵性,她知道人对她的爱。她会以长久地开放、持久地释放淡淡的莲香来回报你的辛勤付出和关注。世事亦是如此,概莫能外,这是我在培育并蒂莲后的新启示。

育莲、爱莲,为其辛勤付出,收获愉悦,我乐在其中。

管爷花又开

杨柏伟

管兄如今江湖名声日隆,人皆以“管爷”戏称、昵称或敬称。管兄长我五岁半,他属牛,我属羊,均为“食草族”,或许因为“饮食结构”相同,爱好多有相近:我们是书友(爱淘书)、棋友(爱下象棋)、酒友(爱喝酒);而且同患“拖延症”(重度)。我们每月必碰头、相聚两三回,大事、小事,嘻嘻哈哈之间也就办了。不过除了朋友、兄弟的私谊之外,我们还有一层合作关系,那就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于是乎我就得时常扮演“逼宫”的白脸。

我没有想到我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后期去分管出版社的艺术图书板块,更没有想到因为与艺术结缘居然还客串了策展人的角色。近期一个让我自鸣得意的实例是去年四月下旬在上图书店·艺术文创空间为管兄举办的“花间彷徨——管继平小品展”。说起来,那次的“逼宫”是靠团队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我只是起到了四分之一强的作用,不过展览的前言是我写的。

新年伊始,新展在即,时隔大半年,管兄又会有什么新花样呢?作品一定是好看、有趣的,我不想多说了。此次吸人眼球的还有文献部分,包括管兄珍藏的名家手札、签名本和老照片、手稿、印谱等等,这是把“压箱底”的宝货可都拿出来了!

虽然再次被逼,管兄倒是不再“花间彷徨”,而是取了一个“花时又逢”的名儿。也许是即将致仕,心态平和了。在此为我的好友、兄长即将到来的新生活而欢呼!